

公共卫生事件与投资组合决策：烙印理论视角

马述忠 雷宇 房超 吴鹏

目录

附录 I 事前分析	1
附录 II 对比职业间差异、北京和上海地区个体的差异	2
附录 III 稳健性检验	3
附录 IV 安慰剂检验	4

附录 I 事前分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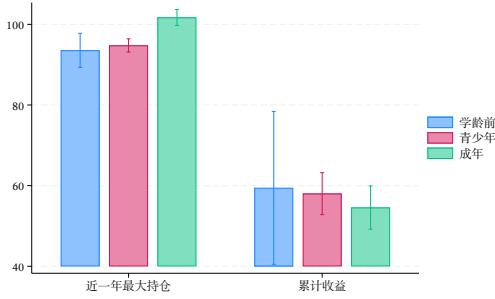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1 分出生队列的持仓与累计收益特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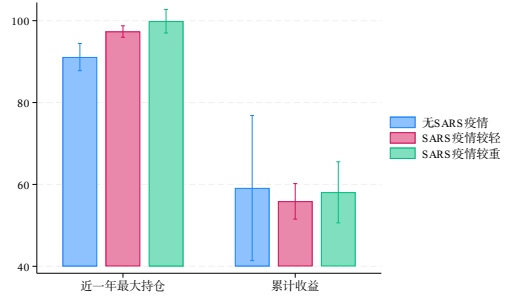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2 分地区的持仓与累计收益特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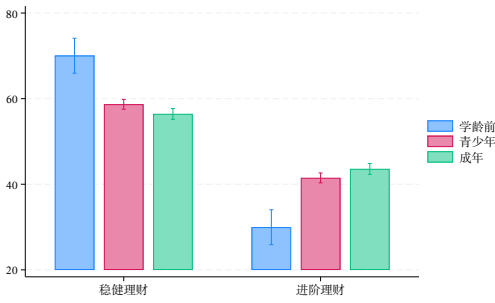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3 分出生队列的理财产品特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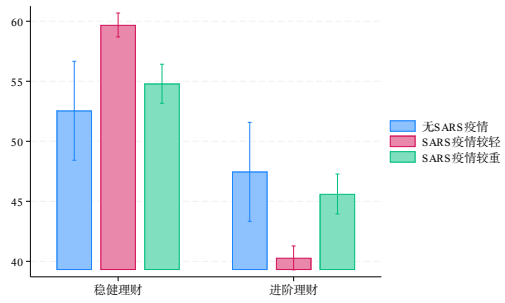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4 分地区的理财产品特征

附录 II 对比职业间差异、北京和上海地区个体的差异

(一) 职业间差异

图 II 1 展示了不同职业个体在 COVID-19 疫情后期持仓和累计收益的差别。根据图 II 1, 一般企业单位个体的在 COVID-19 疫情后期的持仓均值最高, 但持仓差异小于累计收益差异。在校学生个体的累计收益最高, 但方差最大。其次是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个体, 一般企业单位个体最低。图 II 2 展示了不同职业个体在 COVID-19 疫情后期稳健理财和进阶理财占比的差别。根据图 II 2, 无固定职业个体在 COVID-19 疫情后期的投资组合决策最激进, 在校学生个体相对最保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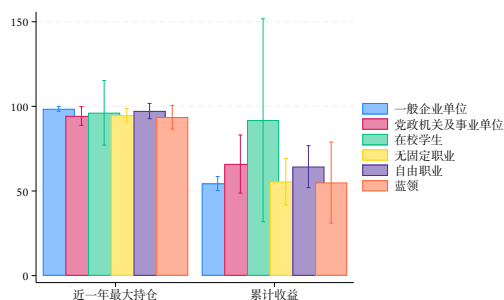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I 1 分职业的持仓与累计收益特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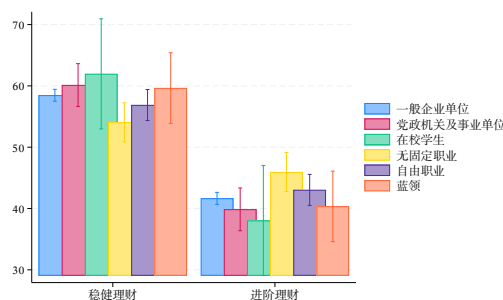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I 2 分职业的理财产品特征

(二) 北京和上海地区个体的差异

北京和上海是我国最发达和居民收入最高的两个地区。值得一提的是, 二者正巧分别是 SARS 疫情严重地区和非严重地区 (上海 SARS 疫情感染人数仅有 7 人)。我们对比了北京和上海地区个体持仓均值和 cohort3 的持仓均值差异。图 II 3 展示了两地持仓均值差异, 不难发现上海地区个体持仓均值略高于北京, 且方差较小。图 II 4 展示了两地 cohort3 的持仓均值差异, 不难发现北京地区 cohort3 的持仓均值远大于上海。这意味着, 在个体收入相似、总体持仓相似的前提下, SARS 疫情经历可能会对个体持仓造成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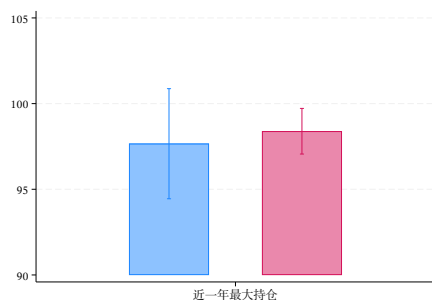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I 3 北京和上海个体持仓均值差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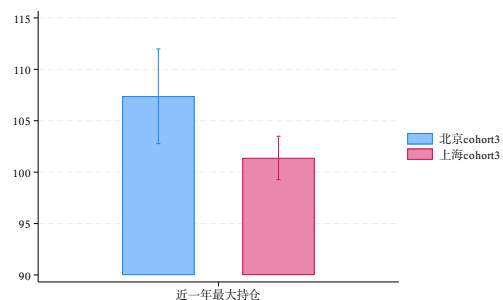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I 4 北京和上海 cohort3 持仓均值差异

附录 III 稳健性检验

表 III1 稳健性检验

	<i>Holdings</i>	<i>Cumulative g_{it}</i>	<i>Holdings</i>	<i>Cumulative g_{it}</i>
	(1)	(2)	(3)	(4)
<i>SARS intensity</i>	1.447***	-0.024***	1.410***	-0.019***
× <i>Birth cohort 2</i>	(0.409)	(0.005)	(0.395)	(0.005)
<i>SARS intensity</i>	1.833***	-0.029***	1.656***	-0.024***
× <i>Birth cohort 3</i>	(0.473)	(0.006)	(0.387)	(0.006)
Controls	Y	Y	Y	Y
Province FE	Y	Y	Y	Y
Birth Year FE	Y	Y	Y	Y
Observations	9917	9918	9537	9538
R-squared	0.093	0.005	0.105	0.004

附录IV 安慰剂检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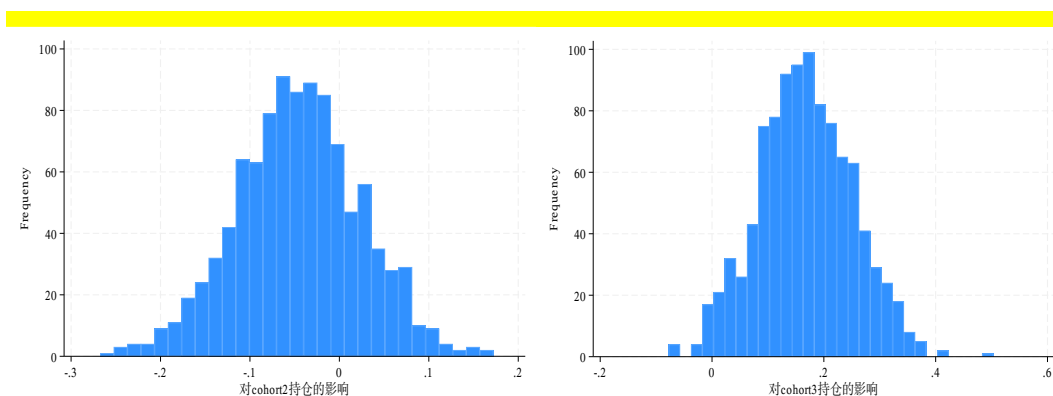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V1 出生队列 2 持仓的安慰剂检验

图 IV2 出生队列 3 持仓的安慰剂检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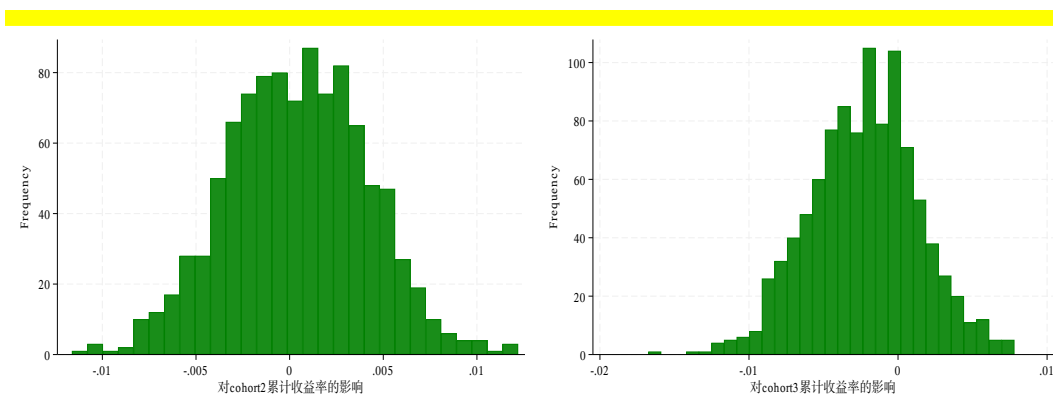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IV3 出生队列 2 累计收益率的安慰剂检验

图 IV4 出生队列 3 累计收益率的安慰剂检验

注：该附录是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组成部分，同样视为作者公开发表的内容。如研究中使用该附录中的内容，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附录下载出处。